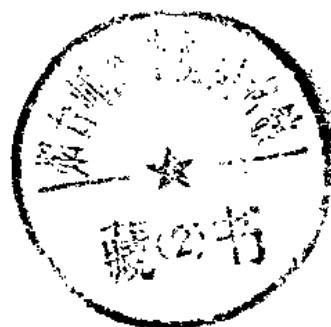


127520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托克托县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82开本 印张 7.8 字数 167千字

1984年12月第一版 印数 1—8000

目 录

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敌特活动	
情况概述	张如岗忆述 孙继文整理 (1)
国民党CC中统在绥西等地的罪恶活动	董叔明 (26)
绥远地区的国民党中央统特务组织	谢新吾 (35) (一) 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的改组 (二)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特种工作指导处 (三) 绥远省党政总队 (四) 第十二战区“民众工作总队”的成立与活动 (五) “绥远省肃奸委员会”的罪恶
绥远战青团纪事	马映光 (62)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统局察哈尔省调查	
统计室内幕	董叔明 (70)
张家口“青年训练队”	高 平 (79)
绥远省“招致分会”	张富仪 (83)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特

- 务间谍活动 正珠尔扎布 (87)
五当召日本化装喇嘛赴藏被捕始末 巴靖远 (102)
五当召的“日本喇嘛” 云昌秀 (111)
清末日本女间谍河原操子在喀喇沁的活动 邢复礼 (118)

蒋介石集团与内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

- 反动势力 沈重宇遗稿 沈元加整理 (130)
国民党绥远“国大代表”的产生 张富仪 (144)
绥远青帮和伪蒙疆民生会 卢健飞 王明远 刘吉悌 (148)

资 料

- 绥远省国民党政权军政特工组织 张问之 (207)
日寇及伪蒙疆政府之特务、警宪机关 张问之 (214)
内蒙古东部地区一贯道的传人、组织、
活动及取缔情况 赵连山 (217)

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

敌特活动情况概述

张如岗忆述 孙继文整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剩下的不过百余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广大地区漫长的战线上。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各个方面，已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状态。在绥远地区，国民党部队只有五、六万人，其基本倾向是以傅作义先生的马首是瞻的。蒋介石为了控制这部分军队，制定的反革命策略是：让绥远部队能守则守，守不住则西撤甘、宁、青地区，与“二马”（马鸿逵、马步芳）部队靠拢，共同把守大西北这个阵地。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绥远省当局与我方进行和谈，极力破坏绥远地区的和平解放。由于我党坚持了“绥远方式”这一伟大的战略思想，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和正确指导下，华北地区解放军和各级党、政、群组织及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终于促成了国民党绥远省当局的和平起义。

我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奉命到绥蒙公安局工作，一九四九年三

月接任绥蒙公安局局长。同年五月在丰镇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被任为公安厅厅长。由于工作关系，对于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的活动，和我方为保卫起义而进行的反特斗争情况，有所了解。兹就记忆所及，为研究历史提供一些资料。其间，为了记事翔实准确，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同时，也访问了当年参加这一斗争的一些老同志，如冀述楷、祁芳、李保民、王若川等同志积极协助取材，并多次进行座谈，又蒙王雁鸣、魏刚、王思齐、贾荫生、徐国卿、王礼茂、王治民、谭觉民等同志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査证。对于大家的赞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这个材料，以“九·一九”起义为中心，综括归纳了起义前后两年期间的一些情况。北平和平解放至“九·一九”绥远起义阶段为一部分；剿匪肃特阶段为一部分。兹分述如下。

北平和平解放至“九·一九”起义

敌特在绥远地区的活动

一、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地区的形势和动态

绥远地区，地处大西北的前哨，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我党很早就在这个地区开展了工作，远在抗日战争开始即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蒋介石为了破坏抗战，通过特务组织疯狂地对我进行破坏，搞磨擦，有不少同志牺牲在日本侵略者和蒋特的屠刀之下。抗战胜利

后，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活动更变本加厉。我公安机关也很早就派出工作同志，建立与发展了相当数量的隐蔽力量，深入到敌特营垒内部，与敌人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为以后进一步开展隐蔽斗争建立了基础。

淮海、平津战役之后，我解放军挥师南下，渡江作战，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反动政府逃亡广州。此时，在华北的解放军于四月二十四日解放了太原，五月一日解放了大同，至此山西全境全部解放。华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所剩无几。绥远尚存的国民党步骑兵五、六万人，在军事上已处于相当孤立的境地。由于全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影响，绥远各族各界人民拥护和平的呼声愈来愈高，国民党广大官兵向往起义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此际，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绥远军政各界绝大多数拥护和平，愿随傅作义先生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并积极响应董其武将军倡导的革新运动，为举行起义积极创造条件。但是，也有些人因多年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对于我党提出的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怀疑顾虑，观望徘徊，存在着对立、恐惧心理。少数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派顽固分子，则极力反对绥远和平起义，梦想跟着国民党顽抗到底，企图坚守绥远阵地，不能守则西撤甘、宁、青地区，与“二马”部队靠拢，死守大西北，他们还扬言，必要时到大青山开展所谓“敌后游击”，以配合美蒋卷土重来。

二、各地特务纷纷逃集绥远，特务头子 张庆恩、史泓等由平来绥部署工作

一九四九年初，平、津、张和山西、西北等广大地区解放后，国民党中央统、军统特务及阎锡山体系的特务，有相当数量陆

续潜来绥远，有的投奔绥远的特务机关承领活动任务，有的则潜伏起来窥伺时机，待机而动。中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华北“剿总”调统室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庆恩，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带着整顿绥远特工、破坏绥远和谈的特殊使命来绥。他将各地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统一于“绥远党通室”的指挥之下，部署任务，针对当时绥远的和平起义运动，进行破坏。军统特务在北平解放后，为了布置华北各地特工潜伏工作，委派军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华北“剿总”第二处处长史泓为华北区区长，前来绥远活动。身份业已公开的原绥站站长庞中兴另派别地潜伏，改任赵思武为绥远站站长，其副站长和支台长仍为陈彤、杨秉仁。所有各地潜绥之军统特务，统一于赵思武指挥之下，对绥远和平运动进行破坏。

三、制造流血事件袭杀我联络处工作人员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我华北人民政府根据《绥远和平协议》，派遣联络处进驻归绥，协同董其武将军执行协议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制订并实行通车、通邮、通电、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双方货币兑换等具体办法。在七月下旬的某日下午，我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的同志由旧城回车站，行至中途空旷地带，突然遭到枪弹袭击，当场有三个同志受伤，其中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受重伤，抢救无效而牺牲。王士鑫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他为绥远的解放献出了生命。后查明这一事件，是由敌特分子策划，部队中个别顽固分子指使，利用赵晓峰的二五八师段景堂团二营六连连长李锐庆充当凶手制造的。

事件发生后，我党中央、华北局及绥远省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一方面揭露敌人破坏起义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坚决贯彻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既定方针。我驻绥联络处同志们临危不惧，坚决、认真地贯彻上级指示，揭露敌人的险恶用心，通过座谈、访问、参观等方式，向当时绥远省国民党政府高级干部、各族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学校、工厂，广泛宣传我坚持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并组织指导进步青年开展读书会等活动，力促起义的早日实现。

四、打击进步力量，砸毁《奋斗日报》

煽动游行示威，散布谣言惑众

北平和平解放后，原绥远省《奋斗日报》积极响应董其武将军关于和平的倡导，在宣传报道方面逐步向人民靠拢，特别是在革新运动开始后，该报对反共文章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逐渐缩减，而着重宣传绥远和平、革新运动的消息，有时还转载我新华社发布的新闻和解放区的消息。这就触怒了敌特分子，成为他们必予破坏的目标之一。一九四九年四月间，即我党在北平同傅作义先生举行绥远和谈之始，驻归绥的二五八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欺骗蒙蔽士兵二十多名，在一个夜晚越墙闯入《奋斗日报》社，捣毁门窗家具，砸烂印刷机器，殴打工友、编辑，大肆进行破坏。《奋斗日报》因此停刊十余天才得恢复。

敌特分子破坏起义和进步运动，制造事端的猖狂活动不一而足。他们在包头还网罗坚持反动立场的军政人员，煽动一些受蒙蔽的人，上街示威游行，张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诬蔑“傅

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公然喊出“打倒傅作义、董其武”、“拥护×××、×××、×××”的反动口号。敌特分子鉴于绥远和平气氛之高涨，狗急跳墙，不择手段地制造动乱，妄图引起内部分裂。他们编造谣言，蛊惑群众，到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共产党马上就要垮台。说什么国民党有可靠的外援，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要来帮助中国剿共，日本空军志愿队已经组成，即来中国参战；“国府”在缅甸训练的军队一出征，很快就会统一全中国等等，妄图动摇广大官兵走和平道路的信心，破坏和平起义。他们还恶毒地诬蔑我党的和平起义政策，在军政干部中散布破坏言论。说什么，“共产党是不会信任你们的。你们再革新再改造，迟早也得被杀掉；你们再进步再努力，最后还是被抛弃；跟共产党走死路一条，跟国民党走前途远大……”等等。

不管敌人怎样穷凶极恶、阴险狡诈，群众是眼明心亮的。广大人民和部队官兵在现实面前，大都能明辨是非，通晓大义，不为谣言所惑，决心追随傅作义和董其武将军，走和平起义的光明道路。

五、中统、军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史泓、田俊等再度来绥，整顿组织和部署工作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我党派联络处驻归绥，协助和促进绥远开展起义工作。国民党政府预感到在绥远的立足点即将失去，除上述垂死挣扎外，再次派特务头子张庆恩（该张于前

段来绥部署工作后返回了南京等来绥，整顿组织，部署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张庆恩由穗经兰州、银川到达绥远包头，随同的还有郭跻堂、刘钊、焦志达、陈儒干、张毓楷、郝世宽等十九名特工人员，企图再次加强特务的部署与活动，以阻挠和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张庆恩在包头以第九兵团政主任身份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首先整顿了特务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共设台湾、海南、重庆、贵阳、绥远等五个办事处），张庆恩自任主任，魏纯美任副主任。该办事处管辖绥远、山西、甘肃、宁夏、新疆等五省，东北、冀热平津、晋察蒙旗等三区，陇海、平汉两线，共十个调查处和一个第七区公路调查站。绥远办事处设在包头，以此为中心，指挥上述省区的特务进行活动。

张庆恩纠集在包头的上述各省、区调查处的特务头子共同策划：（一）加强绥远办事处的领导机构；（二）加强各省、区潜伏工作的部署；（三）各省、区在包头的人员立即奔赴本地域开展工作；（四）选派各地流亡来绥的特务，到解放区开展所谓“敌后工作”。之后，张庆恩即从麇集包头的特务及原来在各地直接发展的特务中，选派出一百一十七名特工，分别到上述省、区、站所属四十一个城市，直线潜伏，进行破坏活动。此外，国民党政府在“统一应变，灵活指挥，作好长期打算”的安排下，已在三月份将“中央党通局”改隶为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所以在本次整顿中，也将绥远省“党通室”改为绥远省调查处，隶属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仍由原主任祁觉民任处长，原绥西站主任史秉义为副处长，魏尚礼为秘书。该处设总务、情报、交通三个科。将包头据点和归绥市区改为两个工作组，其它未变。调

查处也迁往包头与绥远办事处合署办公。

军统特务方面，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华北区亦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又派副区长田峻赴包头整顿特工，布置潜伏。敌人为便于特务活动，伪国防部委任绥远军统特务头子、绥远站站长赵思武为骑兵整编第十二旅副旅长（旅长为鄂友三），在包头设立“骑十二旅副旅长办事处”，作为军统的“华北区”特务活动的指挥中心。绥远地区和麇集包头的一些军统特务分子，在赵思武的统一指挥下，很快分别潜伏到绥远国民党各部队，以军职身份为掩护，从事反对绥远和平起义的各种破坏活动。

六、组织地下反共军，妄图开展 所谓“敌后游击”战争

特务头子张庆恩在整顿特工开展工作的同时，派遣特务分子、反动军政官吏到津、京、张等解放区发展“地下军”，开展所谓“敌后游击战争”，妄图配合在绥远的特工，破坏绥远和平解放。张庆恩从穗来绥时，带来国民党少将师长郭跻堂。郭某是在张家口战役被我俘获释放后逃到广东的，来绥前参加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召开的“华北游击会议”，到绥后就任第九兵团督导主任，实则系阎锡山电委的“察绥边区游击总司令”。郭跻堂接任后，大肆进行活动，刻制印章，领发委任，经他委任的有察冀、察晋、察冀、察热四个边区的纵队司令，有察南、察北、绥南、绥蒙四个边区的纵队长。其间，郭电报阎锡山，请领经费银洋四千元。

张庆恩在包头活动期间，也相继委任了郭灿、张天聪、李本笃、袁世龙等为反共地下军的司令、总指挥、总队长等，派往各

地发展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各反共地下军均自刻印章、颁发委任状，委任各自的地下反共官兵。如郭灿被张庆恩委为“冀热辽边区挺进军总司令”后，曾下令委任一名纵队司令、一名方面军总指挥、一名纵队长，并在津、京、冀等地区发展反动武装，还与北京的反革命组织“青年救国军”第三师勾结在一起，到处散发反动宣传品，开展反革命活动。又如张天聪原系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大队长、骑兵纵队长，曾因顽抗我军被击伤，逃来绥远后又积极与张庆恩挂钩，被任为“察哈尔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他受命后从张庆恩处领得米票三万斤，并变卖自己财物，充作活动经费，到处网罗旧部，拉拢反动分子，组织起反动武装五个游击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计划在张北、商都、康保、丰宁和乌珠穆沁旗等地区，组建一万两千人的“敌后游击队”，待机而动，妄图配合美蒋反共作战，卷土重来。上述李本笃、孙翔臣、袁世龙等等，有的是老牌中统特务，解放前长期以天主教神甫为掩护，从事特务活动，解放后逃来绥远，混水摸鱼，组织反动武装；有的是反动军官，“投诚”后又潜逃绥远，纠集一些反动分子，企图东山再起，与我进行顽抗。

总之，上述这些敌特分子和亡命之徒，是一批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他们，连同他们组织的什么地下反共等等，在绥远“九·一九”起义后，不管如何狡猾，如何隐蔽，化整为零，分散潜伏，都难逃人民的法网，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相继被我公安机关侦破消灭。

七、垂死挣扎，千方百计阻挠起义，阴谋未逞，张庆恩等最后落得锻羽而逃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毛主席、周总理委托傅作义先生并偕

同邓宝珊将军来绥，协助董其武将军发动起义，他们带着毛主席不用兵解放绥远的亲笔信和党中央给予的大批慰问金，到部队进行慰问，宣讲党的起义政策，发动与促进绥远早日和平解放。

中统华北特务头子张庆恩得悉傅、邓两将军来绥的消息后，于八月二十日携带其事先拟就的阻挠绥远起义的“和平建议书”，到傅作义先生驻地美岱召，表示忠心进谏。傅作义先生到包头后，他又几次进行游说。张庆恩看到他的建议未见成效，绥远起义的局势日趋明朗化，于是又在一部分绥远军政首要人员中加紧活动。一面命王国璋、杜品山起草所谓“全面和谈”的《和平意见书》，交由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向傅作义呈递；一面又发动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为首的党、政、军、民各界反对和平起义的签名请愿运动，向傅作义先生及董其武将军施加压力。然而，此时此刻，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起义已成必然。张庆恩等的鬼蜮伎俩只能是枉费心机。然而敌人总是不见黄河心不死，他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乃急电国民党政府请蒋亲来包头劝说傅作义和董其武，以阻止绥远的和平解放。如蒋不能亲来，就请蒋电邀傅作义赴穗磋商国事。又电谓阎锡山、谷正鼎等迅速来电劝阻绥远起义，并献策请傅作义先生的友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姚大海、张晴园速来包头，敦劝傅作义回归助蒋。

国民党政府得悉绥远情况，大耍两面手法。一面密电潜伏在刘万春一一军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对傅作义就地刺杀；一面又电邀傅作义去穗同蒋面商一切。同时又派徐永昌（当时为国防部长）携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来包，请傅先生赴穗共商与我进行所谓全国和谈问题，劝阻绥远不要单独起义。但傅作义先生深明大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坚持推动绥远走向和平解放。于是在董其武将军率领下举行了光荣的“九·一九”起义。

绥远起义的前夕，正当绥远军政首脑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人物酝酿并签署起义通电之际，在包头的特务头子张庆恩，急急忙忙地指定李崑生代理其办事处主任的职务，并对绥远解放后的特务活动进行部署：指令办事处事务员马奋成潜伏在包头，作为特务活动的总枢纽，利用车站前街正大茶庄李仲荫为特务们的接头转手人；宣布魏尚礼为绥远调查处代理处长，胡尚儒为代理副处长。并给王之铸、郭培成等五人配备二百瓦电台一部，潜伏在刘万春的——军军部；胡尚儒、于乐渊等六人配备十五瓦电台一部，潜伏在张朴的三一九师师部。张庆荣（又名张茂堂，系张庆恩之兄）、李守魏、单不移等若干特工人员，有的携带电台，有的持张庆恩介绍，有的凭借关系，亦分别潜入各部队。其余的一些特务头头，如祁觉民、魏纯美、杜品山等，以身份业已公开不便留绥为由同张庆恩一起随着徐永昌的飞机逃命去了。

至此，在绥远地区曾明目张胆公开活动，千方百计破坏起义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们，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只落得个苟全性命于一时，仓惶银羽而逃了。

绥远“九·一九”起义至一九五一 年初的敌我斗争概况

绥远“九·一九”起义，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破坏绥远和平解放的彻底失败。但完整地实现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仍有许多困难。正如毛主席所预料和指出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的。”果然，那些因绥远起义而一时消声敛迹的老牌中、军统特务，由解放区流散而来的特务分子，以及各地逃亡而来的反动官吏，他们互相勾结，利用

绥远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山区易于隐蔽等条件，在“九·一九”起义之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在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更加猖狂起来。他们破坏活动的触角深入到我人民新绥远的生产建设、减租反霸和废保建政等各个方面，甚至阴谋和破坏起义部队实现解放军化，杀害我政治工作干部，等等。兹将其反革命罪行概述如下。

一、组织匪特指挥中心——华北、东北、 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

中统绥远办事处主任张庆恩逃渝时，将绥远办事处的工作交由李崑生代理。李崑生接手后的办事处潜伏在陕坝（杭锦后旗所在地），活动更加隐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张庆恩密电指示李崑生，迅速与各调查处负责人磋商，设法网罗国民党军政要员，组建“华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统一指挥开展工作。李崑生接电后，于一九五〇年元月十九日亲赴百川堡（现临河县新华公社），与田树梅（原阎锡山部中将、狼山屯垦办事处坐办）、崔正春（原系保定讲武堂教官，阎锡山曾是他的门生后，任绥远省军官教导团、教育长、绥远红十字会总会长）、肖应轩（原阎锡山部军长，太原面临解放时到南京，南京解放时经北京潜来绥远河套，以行商为掩护进行活动）等，共同密议数日，成立了“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下称“指委会”），草拟了工作章程、计划，电呈蒋介石中央及其特务机关。其组成人员为：主任委员张庆恩，副主任委员田树梅、崔正春，书记长李崑生，顾问肖应轩，委员张朴、张茂堂、张副元、王之铸、王富国、王元令

刘钊、马继援、朱霁青等。这些人有的是中、军统特务分子，还有的个别人是起义后被改编部队的师、团长。

“指委会”设在陕坝，内设六个组，外设五个区。内六组的负责人分别是：调查组长胡尚儒，军事组长单不移，政治组长栗枝荣，党务组长刘钊，联络组长张茂堂，总务组长贾戌午。外五区的负责人是：三山边区（阴山、狼山、后山）特派员郑文淮，太行边区（山西、河北、察哈尔）特派员梁俭，大河边区（甘肃、宁夏，陕西）特派员李信通，辽河边区（辽宁、热河）特派员李翰周。主要任务：（一）在我内部培养发展反革命势力，指导已潜伏下来的特务进行活动；（二）策动起义部队哗变，收集流亡游散的官兵，组织发展匪特武装；（三）联络我解放区各界“知名人士”，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根据上述任务，敌特采取了普遍发展、单线领导、统一指挥、分散活动等办法，以图推动反革命破坏工作。

根据敌特活动情况，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和灵活多样的措施。用统一研究，分别部署，掌握全，而抓住重点，打进去、拉出来，适时进攻，分头击破的办法，对敌人一网打尽。

“指委会”一案侦破后，我们除将首要案犯李崑生、田树梅、崔正春、张朴、张茂堂等人解送中央公安部审处外，其他有关案犯大部在剿匪肃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二、策动起义部队叛变，破坏实现解放军化

在实现部队解放军化过程中，我党首先向起义部队派政治工作干部，师、团、营、连均增设了政委、教导员和指导员。对此，潜隐在部队内的各种特务，感到对他们的存在威胁很大，于